



《猫耳洞诗选》(中国人民解放军 35276 部队政治部编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3 月出版)是我今生最为难忘的一本书。

我之所以一直珍藏而且经常翻阅这本诗集, 不仅仅因为集中收有我两首战地诗, 而是我一直被战友的诗作强烈地感染着, 我被那些带着战火焦土味、血腥硝烟味的诗作强烈地感染着。我欣赏着那些生长在界河、高山峭岩上的诗花, 每每阅读着那些镌刻在焦土上的诗行, 心灵就颤动, 热血就奔腾……

都说“情场出诗人”, 战场何尝不也出诗人。在老山前线, 在被硝烟熏黑的堑壕里, 在阴暗潮湿的猫耳洞里, 在茅草挑起的露珠里, 在蕉叶筛下的阳光里, “与铁一般的寂静相交替的 / 是炮声, 是弹头 / 撼天动地的爆炸 / 和弹片尖厉刺耳的嘶鸣”, “而对于坚守前沿的我们 / 炮声早已失去威风 / 照常写诗、下棋、读函授大学课程 / 照常作重大课题的思考 / 关于理想、人生和无私的爱情 / 炮声中照样能香甜地入梦 / 那香甜的气息, 是对死神 / 幽默的嘲讽 / 听炮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 一天不听, 反倒心神不宁”(马正建《听炮》)。然而, 下阵地前, 我们没有时间去换洗衣服, 没有礼拜天的舒适, 更没有八小时以外公园里依依的温馨、马路上挽手的安逸, 只能抽空写写家书和情书, 有的把家书写成了诗, 如李涛《妈妈, 假如你思念我》和刘福波《写给爸爸》; 有的把情书抄成了诗, 如黄新《请捎上我的爱》和张庆秋《我不想告诉你》……战争竟将许多军人锻炼成了诗人! 请看马正建的《止血带》——他巧妙地以自己在冲锋前“从容地 / 将止血带扎在腰间”和后方“同龄的兄弟在星期天 / 系上漂亮的领带 / 像年轻的姐妹去赴约会 / 戴上闪光的项链”相映照, 让时间和空间相重叠、前方和后方相连接, 也正因为如此联想, 作品更具现代感。作为老山前线的战士, 我们因为止血带而自豪, 止血带是可以“为自己和战友止血 / 为青春和生命止血 / 为中国止血”的, 坚信总有一天“中国的工厂将不再生产止血带 / 而只生产领带和项链”。

“英雄和诗人是这场战争孕育的‘双胞胎’。”(黄新《幽兰飘香——猫耳洞诗选》序)。战友陶炳旺负伤住院治疗期间

老山诗情

□ 周游

多次提前要求出院, 医生均未批准, 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写下了《我恳求, 恳求……》: “不是这里没有欢乐, / 也不是这里缺少美餐, / 是因为这里

里, / 听不见机枪的怒吼。 / 放我走吧, / 阵地需要我坚守, / 战友负伤还在坚持战斗! / 我有什么, / 不就是几个小小的伤口。 / 放我走吧, / 我恳求、恳求…… / 不是这里没有欢乐, / 更不是你们照料不周, / 战士有战士的理想, / 战士有战士的追求。 / 放我走吧, / 让我去替换负伤的战友, / 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 我不能在这里高枕无忧, / 因为我的壮志未酬。 / 放我走吧, / 我恳求、恳求……” 读着这首充满激情的诗篇, 医护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为陶炳旺不求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安危的高尚情操所深深打动。这首诗曾在战地医院广为流传。值得一提的是, 被成都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李庆双烈士本可以不死, 负伤以后应当转到后方医院治疗, 而他抄上战友陶炳旺这首《我恳求, 恳求……》留给医护人员, 偷偷地跑到前线去了……

《猫耳洞诗选》虽然出自九十二双握枪的手, “没有华丽的辞藻, / 没有修饰的标点, / 只有赤裸裸的情感, / 融合着生命的呐喊”(李新生《军人的诗》)。他们以浓重的色调和质朴的语言写《老山兰》(赵新民), 写《老山松》(王桂安), 写《老山石》(刘敬行), 写《老山泉》(田源)……有《阵地上的“剧团”》(张庆秋), 有《炮位上的旋律》(张玉彬); 有《十五的月亮》(李志民), 有《南疆的相思》(汪润); 有《战士的雕像》(方雅林), 有《烈士的遗愿》(王立江)……

《猫耳洞诗选》共收一百多首诗作, 各自独立成篇, 但汇在一起, 却是一个整体, 折射出一个个忠勇的魂灵, 尤其是周正清烈士《我是党员》、张先祥烈士《我自豪, 我是士兵》和王建洲烈士《写给妈妈的日记》, 无不荡人心魄, 洋溢着为国捐躯的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壮美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猫耳洞诗选》既是一本难得的史料, 也是一部难得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材。每读《猫耳洞诗选》, 我常默想: 忘记老山, 就是背叛! 正因如此, 他们又留给我们写不完的诗, 我们又怎能不写诗? 怎能不诵读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写下的华章?

“几度夕阳红”之管见

□ 张树生

近来, 我的退休同学微信群, 热议《三国演义》的卷首词《滚滚长江东逝水》(以下简称《滚》), 对其中“几度夕阳红”的理解, 或曰“歌颂英雄”, 或曰“讥讽英雄”, 或曰“感慨英雄”, 意见纷纭, 不一而足。如何解读《滚》词, 如何领会“几度夕阳红”的涵义, 值得深究探讨。

《滚》词, 明代著名文学家、明代三才子之首杨慎晚年所作。本是他的《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明嘉靖三年朝廷“大礼议”, 杨慎倔强谏诤, 得罪明世宗, 被谪戍云南永昌卫。时当壮年、才华横溢的他, 从此政治生涯结束, 一生至死都苦苦煎熬在边陲之地。《滚》词以深沉、厚重、开阔的文笔, 说秦汉之“是非成败转头空”, 字里行间融入历史往事空幻的慨叹; 同时, 作者身世浮沉、人生飘零的况味亦渗透其中, 让人涵泳不已。

明代罗贯中在“讲史”话本基础上创作的《三国演义》, 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清康熙年间, 毛宗岗父子在修订罗本《三国演义》时, 将杨慎所写的《滚》词移置于《三国演义》的开头, 没有署名, 只说“调寄《临江仙》”。自此, 社会大众代代熟读《三国演义》, 很少有人怀疑《滚》词不是罗氏“亲生”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经 84 集电视剧《三国演义》热播以及媒体的广泛传唱, 由谷建芬谱曲的《滚》词的主旋律飘荡在神州大地的大街小巷、千家万户, 老少会唱、妇孺皆知——有谁说《滚》词唱的不是《三国演义》, 不是三国英雄故事? 三百年来, 杨氏《滚》词与罗氏所演说的《三国志》通俗故事, 二者呼吸相通、血脉一体, 其毛氏“嫁接”的痕迹, 几乎被岁月磨光, 难以寻觅。

《滚》置于《三国演义》的卷首而作为长篇小说的开篇词, 让我们能够感受到, 出身贫寒、地位卑微的文学批评家毛宗岗, 拥有与杨氏相同的咏史眼光, 或也有过在社会下层浮沉、漂泊的深切体验。应该看到, 《滚》词承袭《三国演义》卷首“开白话”的文学使命, 成为鸟瞰这株艺术大树的思想之光后, 其原有的咏叹对象及抒情主体, 发生了相应的迁移。在毛氏的“导演”下, 罗氏成了毛氏的化身与代言人, 视隐幕后幕的杨氏的原作如己出, 借以吟诵咏叹曾经波澜壮阔而最终虚空幻灭的三国风云。这大概就是《滚》词与三国故事血肉相连、精神相通的原因。所以, 解读《三国演义》开篇的《滚》词, 既要把握住原作所内涵的穿透力

史的思想认识, 又不能离开《三国演义》的故事内容, 不能离开《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

要吃准“几度夕阳红”的涵义, 首先要吃透《滚》词的主题思想以及它在整部《三国演义》宏大艺术构思中的地位、作用。《滚》词的下片, 说白发渔樵于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饮一壶浊酒, 笑谈“演义”“古今多少事”。其作用是结构上总起小说全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滚》词的上片, 以日夜不息奔流东逝的江水, 以千古依旧的青山, 对照早已被浪花淘尽的“英雄”, 对照曾经几度璀璨夺目而今沉没久矣的“夕阳”, 告诉人们, 那些曾为“是非”而驰骋纵横沙场、因“成败”不惜肝脑涂地的“英雄”“夕阳”, 永远地化为尘埃而消失在历史的天空, 清晰传达出万事万物皆空的道家史观。毛氏置长篇小说开篇之首的《滚》词, 以个性的感慨隐然提示读者, 要“尽”要“空”地去俯瞰英雄辈出、夕阳几度而风雷激荡的三国史事。联想《红楼梦》中鲜花著锦、烈火烹油之盛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最后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其所表达的生活繁华虚无的观点, 可见“万物归无”的老庄思想对中国小说文化的深度影响, 对中国文人思想的深度影响。

要吃准“几度夕阳红”的涵义, 其次要清楚《滚》词自进入《三国演义》就是小说气脉相通、纹理连接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不孤悬于作品主体内容之外, 其所抒发的深沉的人生感慨, 要迁移理解为孕育于魏蜀吴的三国故事。换言之, 是以三国故事来为《滚》词做注脚的, 来为“几度夕阳红”做注脚的。这样, “几度夕阳红”的涵义所指, 以及其中“几度”“夕阳”的具体含义, 也就呼之欲出。以日喻君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内容, 所以, 依据《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 “夕阳”之“阳”, 当指开创魏蜀吴三国基业而先后荣登九五大位的时代英雄曹操(去世后被迫称为魏武帝)刘备孙权, 当指他们立功立事、开国称孤而千古传颂的英雄业绩。由此, “几度”的含义一目了然。《滚》词何以在“阳”之前冠以“夕”呢? 因为, 相对于“朝阳”来说, “夕阳”喻指经历过血和火洗礼而有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 寓意浑厚, 形象丰硕, 壮丽辉煌, 可谓魅力“无限好”。同时, 一个“夕”字含蓄地告诉人们, “夕阳”毕竟“近黄昏”, 在走向灿烂夺目的顶点后, 势必最终得淡出大地的视线, 最终要消失于这个世界, 从而不着痕迹地涂抹上“万物归无”的色彩。

领悟《滚》词所蕴含的道家思想, 不脱离《三国演义》文本体会《滚》词与正文故事血肉相连的关系, “几度夕阳红”的涵义, 便有如山峰穿云破雾、呈现出原作所没有的全新面貌, 令人豁然开朗、眼界一新。

海量信息来袭

□ 赵厚喜

期待, 还似带歉意。过了几年, 我想明白了, 当时我太幼稚了, 受当时信息误导太深了, 太想往“高”“大”“全”上靠了, 忽略了起名的常识或习惯——通常姓名中间一个字须体现辈份、传承。换言之, 假定孙副厂长出差的城市是北京, 给儿子起的名字叫孙北京, 其中的“北”字肯定不与他儿子所在辈份如“忠”啊“建”的相同, 孙副厂长怎么可能不遵家谱为儿子乱起名呢?

两个例子, 无非是想说明, 那个年代宣传的英雄人物、报道的先进事迹基本都不错, 总体真实。但为了更能激励世人积极、向上, 常常作些诸如“耳边想起毛主席的教导”之类的拔高处理。孙副厂长的事迹并不轰动, 我没有将不成立的“联想”付诸文字。但是, 我习惯性地往这方面想, 其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这是那个年代信息给人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再看当下, 只要你用了微信, 无需看报纸、听报告、进课堂, 海量信息纷至沓来, 目不暇接。如同卡拉 OK 催生一大批民间歌唱家一般, 在海量信息的熏陶下, 人人都是“政治家”“名医大师”。谈国家大事, 口若悬河, 纵横捭阖, 经世济国。论油盐酱醋, 言之凿凿, 毫克必较, 关乎健康。我妻也不超然, 兴趣侧重医学、保健, 这个不行, 那个不准挂在嘴边, 引经据典, 关爱有加。有时我不耐烦了, 忍不住“夸”她, 你比医生还要医生! 我始终认为, 就算信息无误, 没有纳入个体差异, 可放之四海, 但不皆准。具体到人, 须量身定做, 有所取舍, 不可照搬。

我们时刻都在接受信息, 这是客观现象, 无可回避。当今海量信息的传递以及获取信息的便捷, 丰富了人们的知识, 拓宽了人们的眼界, 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 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 海量必与庞杂、真伪结伴、共生。如何甄别信息, 有效利用信息而不为信息误导, 这是我们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 90 年代, 各地开展了经济体制改革, 不少主管部门发文撤销了一些下属单位。下属单位被撤销后其原来的债务由谁来承担? 最高人民法院发文明确, 由作出撤销的部门作为被告(先行提示是“被告”, 而不是“承担”)。信息甫出, 债权人高兴了, 被撤销的单位本来就半死不活的, 这下好了, 由

肥“老子”替穷“儿子”还债了。许多发文的主管部门被裹挟到债务纠纷中了, 用现在的话说, 被“被告”了、躺着中枪了。当时的高邮市供销合作社最为典型, 堪比窦娥。我是该社的首席法律顾问, 对最高人民法院的信息作了研究。

主管部门根据上级改制要求, 撤销应当撤销的下属单位, 没有错。被撤销的单位从法律上类似于已死亡的自然人, 死人当然不能做被告。最高人民法院据此明确作出撤销的部门为被告, 也没有错。既然如此, 为什么主管部门撒下的是龙种, 收获的是跳蚤? 经研究, 我的法律思辩逻辑如下: 单位的债务依法由该单位自行承担, 恒定不变。单位破产, 由“清算组”(现称为“管理人”)介入, 通过清理、清算, 以破产单位的财产偿还债务。“清算组”虽在某些方面代行破产单位的职责, 但“清算组”不是破产单位。说得再直白些, “清算组”是职职处理破产单位后事的临时组织。“清算组”既不应从破产单位获得财产(合理的劳务报酬除外), 也不应为破产单位贴钱还债。至此, 我的结论水到渠成: 最高人民法院信息中的主管部门的身份和作用就是破产程序中的“清算组”, 承担的是对被撤销单位财产清理、清算责任。破产单位的债务处理只能限于被撤销单位的财产, 不应殃及到主管部门。“被告”的程序性身份与偿还债务的实体责任不应混淆。两个月后, 最高人民法院紧急补充发文, 内容与我的理解一致。

滚滚前进的法车车轮, 将我们带进了日臻合理的责任形式多样化的时代。然而, 当年就连司法界的很多人也是将被被告身份和债务承担等量齐观、分辨不清的。否则, 就不会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紧急补充信息出台。

当今信息林林总总, 漫无边际。信息之间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已然受受众的幸福烦恼。怎么办? 从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趋势, 我们已经步入了专家时代, 人的时间、精力又是有限的, 我基本不会关注与我工作、兴趣无关的信息。遇到了疾病、不懂的事, 请专家解决。对诸如中产阶层、幸福指数之类的评判标准信息, 坚决持不以为然的姿态。是中产阶层怎么了, 不是中产阶层又怎么了? 陷入悲伤, 系徒增烦恼。沾沾自喜, 属自我麻痹。是与不是, 都不会添、减你现实的财富或改变你的经济现状, 对号何益? 踏实工作, 活好当下, 唯是正途。“鞋子合脚不合脚, 只有脚知道”。

海量信息后又有了云数据之提法。海上一一定有云, 云下未必有海。想必云数据属表示信息量大的“最高级”。愿我们游海而不被淹, 赏云而不为遮。

与信息闭塞、单一的正统教育时代相比, 如今我们无疑进入了信息爆炸、言论自由的时代。从信息传播层面及其对人的影响, 两个时代孰优孰劣很难评判。

世人常常感叹, 上世纪 60 年代前出生的人思想单纯, 能吃苦, 富有责任感。现在是一代不如一代, 年轻人花钱多, 挣钱少, 40 多岁还啃老。我以为, 60 年代前出生的人的前途共性, 与信息闭塞、单一的正统教育无关系。江姐、黄继光、刘胡兰、邱少云等烈士的高大形象, 永驻心间。马、恩、列、斯、毛经典语录, 保尔·柯察金著名的“人的一生, 应当这样度过……”等名言, 根植脑海。即便对文革结束后的上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 我阅读的兴趣和重点也是励志方面的。看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小说, 热血沸腾, 浮想联翩, 当代英雄、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冲动油然而生。幼学如漆, 这些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终生的。客观地说, 如我比较“传统”之辈, 敢为人先的闯劲可能不足, 没人大红大紫, 但干一行爱一行, 恪尽职守, 事业稳定; 仰事父母, 俯畜妻子, 家庭幸福; 行不更名, 夜不梦惊, 心无愧怍。你能说那个时代信息闭塞不好?

诚然, 那个时代传递的信息, “高”“大”“全”是英雄、烈士、先进人物的标配, 细节上的失真、拔高一定存在。比如, 董存瑞手托炸药包炸碉堡时高呼“为了新中国, 前进!”的描述, 我就很怀疑。极有可能是他不愿意看到战友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 一心为完成炸碉堡的任务, 什么话也没有说(枪炮声大作, 喊也听不见)就完成了壮举。

行文至此, 脑海中不禁浮现出 1982 年我在县“文训班”暑期社会实践期间, 由纪世文先生(时任县政府办公室秘书科长)带队, 采访车逻除尘设备厂孙副厂长时的情景。孙副厂长 30 岁不到, 分管销售。他介绍, 他们厂在生产的钢管床喷涂图案上, 能迎合全国不同区域人群的审美情趣, 销往南方的淡雅, 卖到北方的喜庆, 业务红火。他一心扑在工作上, 儿子出生时, 他还外地城市忙推销。介绍到这, 他恰巧有事临时出去一下。我当时 20 岁, 天真地按时代“赋予”的写作套路展开了联想: 孙副厂长会不会用出差所在的城市名为儿子起名, 以作纪念? 这样, 写出来的材料不是更生动了吗? 印象中, 这个城市的名是可作男孩名的, 以此起名不会混淆性别, 联想是有基础的。我把深挖素材的想法向长我一辈的纪先生说了, 纪先生淡淡一笑, 肯定地说“不会”。我不甘心, 追问的结果证实了纪先生的判断。孙副厂长对不能满足我急于证实的